

4月29日，农历一九一一年四月初一日。所以清华的校庆日（周年纪念日）应为公历4月29日。虽然我们至今尚未查阅到1911年4月29日清华学堂正式开学的原始记录档案，但清华至少在89年前（1923年）就已正式将4月29日（公历）确定为校庆日，并一直延续至今。

清华1923年以前的校庆日（周年纪念日）庆祝活动的举办日多在5月份，活动的举办日多围绕农历四月初一日前后，多选择星期六。1923年以后，清华明确规定4月29日为校庆日。校庆活动的举办日期有所变化，开始时围绕4月29日的前后，

或4月，或5月，多选择在星期六；后来因返校校友增多，来宾增加，活动增多，校庆规模变大，故将校庆活动的举办日多选择在星期六、星期日两天。继后又因返校清华毕业老校友和校外来宾越来越多，而他们平时有职在身，回校不便，为方便他们来校参加校庆，校庆活动的举办日又慢慢向星期日过渡。再后来，为了使校庆活动举办日和4月29日的校庆日联系紧密以及方便学校的月度工作计划安排，校庆活动举办日逐渐演变为现在的每年4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日的做法，最终形成惯例和共识。

## 由父亲寄给巴金的一封残信说起

○曹彭龄

### （一）

2008年6月末，收到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寄赠的《写给巴金》一书，其中收有父亲曹靖华1948年11月22日写给巴金先生的一封信：

巴金兄及文化生活社：

弟已迁入清华……<sup>(1)</sup>如故，祈释念。清华同学组有……<sup>(2)</sup>图书馆口，专收内容坚实书刊，供全体同学阅读，管理亦由同学负责。唯同学物力有限，购书匪易，望祈将大着及贵社所刊各书见寄，使数千青年阅读，则嘉惠学子，感同身受也。再叙，顺祝刻安。

弟 靖华 上  
十一、二十二

（文化生活<sup>(3)</sup>往京敝寓所汇版税，已收到。以后每次仍按京寓花四址结汇）

下附原编者注释：

(1)原件此处残缺。

(2)原件此处残缺。

(3)“文化生活”、“文化生活社”均指巴金曾经担任总编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

父亲是何时认识巴金先生并同他交往与通信的，已无从考证。我们知道巴金先生不仅是著名作家，也是编辑家、翻译家、出版家。正如他晚年写的回忆文章中说：“我一直被认为是作家，但我也搞过较长时期的编辑工作……连续二十年中间我分出一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文学书的编辑和翻译方面。”1935年5月巴金、吴

## □ 史料一页



一九三四年曹靖华摄于北平

朗西在上海创办文化生活社，同年9月更名为文化生活出版社。据《鲁迅日记》载：1935年9月15日“河清邀在南京饭店夜饭，晚与广平携海婴同往，同席共十人”。河清即作家、翻译家黄源先生，他当时与茅盾、黎烈文等协助鲁迅先生编辑译文社《译文丛刊》。该丛书原由生活书店出版，后生活书店却表示“无意再出版”。那时大多出版商因赢利少，不愿出版翻译作品。1934年12月4日，鲁迅先生给翻译家孟十还先生信中还提到他很想出版果戈理的作品集，“……不过现在即使有了不等吃饭的译者，未必有肯出版的书坊。”而文化生活出版社不仅接受被生活书店拒之门外的《译文丛刊》，还同意将鲁迅先生译的果戈理的《死魂灵》列入改由他们出版的《译文丛刊》的第一部。鲁迅先生自然由衷地高兴。那次晚宴，便是鲁迅、茅盾、黄源与巴金、吴朗西议定《译文丛刊》改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日子。同年10月8日黄源、吴朗西同到鲁迅先生家中签订了正式的合同。我们推测，父亲读过巴金先生的作品，知道他如鲁迅先生所说：“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

作家”。但知道巴金先生还是翻译家、出版家当是在《译文丛刊》改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之后的事。因为在这之前，父亲译的《白茶》、《蠢货》、《三姊妹》、《第四十一》等，多是通过鲁迅先生和未名社同仁在未名社出版的。

1938年秋，父亲因支持汉中西北联大学潮，被国民党教育次长勒令解聘，忽收到要他速去重庆中苏文化协会报到的电报，他携全家翻越“难于上青天”的蜀道赶到重庆，始知是周恩来提名让他“发挥专长”，担任协会常务理事，负责编辑会刊《中苏文化》及组织编译出版苏联反法西斯文学作品。为做好此事，自然需联络、团结包括茅盾、戈宝权、叶以群、袁水拍、彭慧、孙绳武、陶建基等一批作家、翻译家；还需和包括上海沦陷后巴金、吴朗西在重庆创立的文化生活出版社重庆分社等出版机构打交道。父亲与巴金先生熟识并交往应是那个时期。自然，父亲与巴金先生接触，绝非只商谈出版事宜，他们同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它与新华日报、中苏文化协会及“陪都文化界七团体”一样，是周恩来亲自领导下的进步文化团体和同国民党亲日派与特务机关激烈斗争的基地。为配合斗争形势的需要，他们经常在一起集会，研究问题，发表宣言……是文化战线上与国民党亲日派，以及张道藩之流所主张的用醉生梦死、淫秽下流的图书麻醉青年进行战斗的同一条战壕的战友。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还特意在他下榻的“桂园”约见巴金先生、葛一虹和父亲，仔细询问了他们工作、生活情况；同他们谈起战后国内外形势可能的发展变

化；告诫他们重庆谈判即使达成协议，也只是表面的东西，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实行独裁统治的野心不会改变。毛泽东的谈话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面临的严峻形势，增强他们克服困难的信心。

值得一提的是，自打抗战以来，重庆外来人口骤增，住房难觅，父亲最初只好只身住在协会，把家眷送到距重庆三百里外的白沙镇，与未名社时期的好友台静农、李何林两家“同楼共伙”。由于相距太远，来往不便，而父亲参与的在重庆远郊集资建房还尚无眉目，十分焦虑。一位友人得知文化生活出版社在沙坪坝有两间闲置库房，建议父亲同巴金先生商量暂时借住。据母亲晚年回忆，我们后来在重庆大学下面嘉陵江边的立园住的两间小屋，就是巴金先生允诺让我们借住的，直到合作新村的集资房盖好后，我们才搬离。后来，巴金先生和新婚不久的妻子萧珊，还去合作新村看望过父母亲，并顺路去了丰子恺先生自建的“沙坪小屋”。那时，合作新村与“沙坪小屋”所在的沙坪坝还是重庆的远郊区，每天两辆动不动就抛锚的对开的公交车是唯一的交通工具，耗费一天时间跑一趟，也该算长途跋涉了……

抗战胜利后，巴金先生返回上海，仍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父亲携全家随中苏文化协会复员南京，依旧负责编辑《中苏文化》及苏联文学翻译出版工作，为联系出版事经常去上海，自然免不了仍继续同巴金先生接触。他与巴金先生的书信往来，定然远不止这一封。只是，在当年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特别是我们所在的中苏文化协会，一直是国民党特务重点监视的对象，用父亲的话说，我们是“提着脑袋

过日子”，为顾及写信人安全，即使是纯“公务”信函，父亲也随时销毁，从不留存。因而，看到《写给巴金》中收入的父亲写给巴金先生的这封信，尽管有残缺及打着口的遗漏，但内容是完整的，父亲在信中恳请巴金先生与文化生活出版社“将大作及贵社所刊各书”寄奉“专收内容坚实书刊”的清华学生自办的图书馆，因为“同学物力有限，购书匪益”。在那个年代，仅“内容坚实书刊”几个字，便足以表明，这两位长期在同一战壕战斗的战友，彼此的关切与信任。这封信不仅见证了父亲与巴金先生的友谊，也说明了他们（以及老一代进步文化工作者们）当年为青年学生能读到“内容坚实书刊”所付出的心力。

## （二）

这封信也让我们联想起一些相关的事情。

自打1947年3月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的中共代表处被迫撤离南京之后，国民党特务机构对进步文化人的迫害更加肆无忌惮，就连我们姐弟外出，身后也会长起“尾巴”。1948年国民党政府垮台前夕，连最后一块遮羞布也扯掉了，反动当局横征暴敛，通过发行“金圆券”，恨不能把最后一点民脂民膏都搜刮干净。穷苦百姓走投无路，只能去抢，南京暴发的饥民抢米、抢面、抢煤、抢油的风潮，和北平大中学校“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游行示威，迅即扩展到上海、武汉、成都、重庆……特务机关磨刀霍霍，协会时常接到恐吓信及电话。风声紧时，我们一家便四散开来，为的是即使特务闯来，也休想

## □ 史料一页

把我们家斩草除根。1948年7月的一天，父亲接到一封身陷泥潭却天良未泯的青年的信，告诉他已被列入黑名单，要他“迅即远走，免遭毒手”。党也要他“相机撤离”。恰在此时，他接到清华大学冯友兰先生邀他去清华任教的聘书，便借去上海办理出版业务之名，转赴北平。稍事安顿后，便捎信催母亲携我们姐弟北上。当时由于经济拮据，父亲走时还向戈宝权先生“蒙借十元”，母亲带我们北上，单筹措盘缠便颇费周折。母亲一方面应付着特务、暗探的盘查、刁难，一方面托人，找关系筹措北上。待我们辗转自上海搭乘北上的最后一条船至天津，再转赴北平清华园，已是11月下旬父亲写给巴金先生这封信前后的事了。

我们到清华之前，父亲住在工字厅单身宿舍里，我们到后搬到北院五号。那原是清华某教授的住宅，就在我们迁入前不

久，由于时局变化，那家主人举家赴美，学校决定将他们遗留的家具集中锁在一个房间，借给我们暂住。我们搬去时，虽说父亲的学生们已帮助打扫干净，但新安一个家，仍得忙乱一阵。我们来时带来的几箱书，一直堆在角落来不及收拾。大约一周之后，生活渐渐走上正轨，姐姐苏玲由南京金陵女大转入燕京大学；我也在父亲的老友李广田教授兼任校长的清华成志学校借读。记得一天放学回家，父亲递给我几本书，大约是他译的苏联小说《虹》、《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保卫察里津》之类和一张字条，要我送到他给巴金先生信中提到的那个“清华学生办的图书馆”去。原来他已将我们带来的那几只木板钉的箱子打开，开始清理了。我印象里，那图书馆就在清华大礼堂至二校门我去成志学校途经之路以西不远的一幢楼房的底层。当值班员看过我递过去的纸



1948年10月，曹靖华（前右2）与李广田（左2）和吴晓铃（左3）、石素贞（左1）夫妇等在清华园合影

条和图书时，眼睛在镜片后面兴奋地忽闪着：“这书正是我们需要的，请代谢谢曹教授……”记得那是一个二三十平方米的大房间，里面摆满一排排书架，架上的图书大都包着封皮，书脊上用毛笔写着书名。不知为什

么，一本书名让我好奇，顺口念了出来：“怎么办？”不料那位值办员立即抽出来递给我说：“你有兴趣也可以借去看，期限两周，只要登个记就可以了。”说着便领我去桌边登了记，让我很不好意思。回家告诉父亲书已经送到，他们还借了一本书给我。父亲接过书，一边翻一边问：“这是你自己要看的还是人家帮你选的？”我说：“我只是觉得书名挺怪：《怎么办？》，什么怎么办？”父亲笑着说：“你看这书还太早，看不懂就快点还回去，免得耽误别人借。”那本书对我这样年龄、经历的孩子来说，也确实太深了。一两天后，父亲又从清理出的书中找出两三本，让我送去时，我也顺便将那本《怎么办？》还掉了。说来也怪有趣，那时，虽未能看完那本书，却记住了作者的名字：车尔尼雪夫斯基。待真正读那本书，已是上大学以后的事了。

对那“清华同学自办的图书馆”，印象中我就去过那两次。

由于时局发展很快，至12月13日上午，北方已传来隆隆炮声，学校宣布停课，老师让大家立即回家，不要在路上逗留。路过二校门时，平时路边的小商贩和闲杂人员已不见踪影，除了校卫队外，学生纠察队也参与值勤。原来，清华学生自治会组织的巡防委员会已经行动起来，配合校卫队巡逻护校，严防敌特破坏。到吃午饭时，北墙外一阵紧一阵的机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已清晰可闻，不时还有流弹从空中嗖嗖地掠过。晚间，学校安排北院的教授与家属去大图书馆底层暂避。第二天早晨，清华附近的战事似已结束，枪炮声已转向青龙桥、八大处一带。当天下

午，随着解放军代表来到清华，欢庆解放的歌声、笑声、锣鼓声迅即响遍了校园的每个角落……

解放后，父亲社会兼职及各种会议与活动陡增，直至1949年7月，我们迁离清华，他再也没有精力、时间顾及那个“清华同学自办的图书馆”了……

### （三）

父亲给巴金先生的这封信，还让我们联想到前几年，我们撰写父亲《传记》时，为了解父亲1925、1926年受李大钊派遣去开封国民第二军顾问团和广州北伐军总顾问加伦将军当翻译的相关史料，曾去过设在沙滩原北大红楼的“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也顺便了解了有关父亲1948年为设在红楼的北大学生自办的“子民图书室”捐书的相关情况。这是因为在1993年出版的父亲《译着文集》的书信卷中，曾收有父亲1948年致北大“子民图书室”的两封信。其一是：

径复者：十一月廿七日来函敬悉。诸位创办《子民图书室》，发扬子民先生教学自由、研究自由精神，在今日尤为切要。刻检奉手边现存之拙译及拙编十部：计《望穿秋水》、《死敌》、《梦》、《恐惧》、《虹》、《铁流》、《保卫察里津》、《俄罗斯问题》、《团的儿子》及《巴黎的陷落》，用寻常挂号寄上，来日收到后，望祈示知，以免悬念。所寄书内有数册为渝土纸本，印刷虽劣，但对战时后方文化活动，颇有纪念意义也。敬复北大子民图书室。

曹靖华  
一，十，南京

## □ 史料一页

其二是：

子民图书室诸位先生：

时蒙惠寄《图书与学习》及《北大半月刊》等，均先后收到，深为感佩。望继续努力，发扬子民先生教学自由精神，突击黑暗，争取光明。

刻邮奉近出拙译《城与年》精本及拙编丛书《苏联见闻录》（茅盾）各一册，收后望示，顺祝  
学安

曹靖华上  
六、一

据“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副馆长陈翔同志提供的相关资料表明，1947年在北平地下党领导下，北平大中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北大已成为北平学生民主爱国运动的堡垒，各种进步社团、读书会、自治会相继成立。学校图书馆藏书虽多，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书却严重不足，更不用说宣传革命思想和理论的“禁书”了。为满足斗争形势发展及学生们如饥似渴的学习要求和团结教育广大青年，地下党决定筹建一个由学生自己管理的图书室。此决定得到各读书社团的积极响应，北大文法学院同学自发地将百余本私人书刊，集中到红楼一层的167房间，藏书虽不多，却成了子民图书室的雏形。

1947年9月新学年伊始，北大学生自治会便通过决议宣称：“为纪念已故校长蔡子民先生，继承其兼容并包精神，收集各种书籍，培养自由研究风气，发扬民主与科学的传统，决定成立子民图书室。”为取得“合法地位”，还设法向校长胡适申请到购买必需设施的经费和聘请包括胡

适、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准及许德珩、冯至等30多位教授为导师。经过一个多月紧张运作，于1947年10月21日在红楼167号房间正式开馆。他们还以各种方式向社会各界，包括各知名书店、报刊及社会与文化界人士广泛募集书刊。他们的征集活动得到社会广泛反响，《大公报》、《世界日报》、《华商报》……刊登了《红楼征书》的新闻与相关报道。在开馆第四天，即1947年10月25日，巴金先生即回信说：

“书可以捐出一部分，过两天当陆续寄上。”并说托他“转给李健吾、赵家璧诸先生的信已转去”。同年12月6日又写信说：“你们太客气，捐一点书算不了什么，以后不要寄邮费来”。那时，他已先后寄过两包书，“以后还预备寄上一些书，好在你们办图书室，什么都可以容纳”。许广平先生收到征募图书的信件后，于1947年10月31日回信说：“嘱捐鲁迅著作以充实贵室，自应尽力，敝社印行鲁迅全集早已售罄，无以应命，三十年集尚可设法，但恐邮汇延迟，且策安全，最好由贵校有办公人员南下之便，凭函来取，当即奉上无误。”当她陆续收到图书室寄奉的章程及《北大半月刊》、《图书与学习》等刊物后，于同年12月18日更热情地复信说：“各函统拜收，图书室章程及北大新闻等亦先后收到。先生等不遗在远，从各刊物中使我重新呼吸在学术氛围之下，如同置身于‘民主广场’中，一如以往，追随各先进同学参加运动，前尘近影，溶合一炉，感怆之情，深以未克努力为惧，所幸以后源源得读贵处期刊，藉他山之鞭策，图异日效驱驰，即作执鞭，或不我弃欤？子民先生孕育群才，为国奠

基，今有图书室之设，允宜合力支持”。并再次提出：“倘有便人，当更书献（邮寄不便），昔鲁迅先生对北大亦拳拳致意，广平不敏，当敬体各先哲遗教，肃此布臆，并致敬礼！”1948年2月，金水庆同学携子民图书室公函往见许广平，在他离沪当晚许广平先生交其一套楠木匣装的《鲁迅全集》，并致函图书室：“……今晚金君因离沪在即，特来取书，即将《鲁迅全集》托其带上，该书皮面烫金，道林纸印，铜版纸图，而最值珍贵的是有贵室长子民先生亲题之字，以为贵室永久纪念，其意义弥足珍视的。金君搭海船上，恐须稍稽时日，请毋急急，恐劳焦念，特先奉达。”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楠木匣装《鲁迅全集》纪念本，全国仅有两部，一部由许先生自己保存，另一部则捐给了子民图书室，足见她对北大学生自办的图书室的重视与期望。金水庆同学将书混在几位同学行李中，躲过了国民党军警多次检查，终于将它安全带回北大。子民图书室收到这部珍贵的图书，特意在民主广场展览三天，吸引了大批北大师生和外校青年。许广平先生不仅向图书室捐赠图书，在阅读图书室寄给她的《北大半月刊》等刊物时，发觉有的文章用词过于犀利、直白，也及时写信提醒“尚望随时祥光稍敛，以减注意”，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足见她对青年学生的关爱。

据不完全统计，叶圣陶、朱自清、李广田、冯至、葛一虹、曹辛之、臧克家、金仲华、靳以、冯宾符、沈从文等众多作家都踊跃向子民图书室捐赠了图书。沈从文先生得知图书室的一位同学去沪探亲，还写信给巴金、黄炎培、张骏祥、刘北

汜、陈敬容等，向他们热情推介子民图书室。

子民图书室在香港与海外华侨中的影响也迅速传播，著名华侨陈嘉庚先生寄来了他著的《南侨回忆录》，不少侨胞还纷纷募集捐款，为图书室提供了财务支持。

子民图书室不仅对本校同学开放，还对中学生和社会青年开放。它以秉承蔡子民（元培）校长“兼容并包”的精神，成为党领导下的一个发扬“五四”传统，团结教育青年，突击黑暗，争取光明的阵地。著名诗人邵燕祥在为《青春在黎明前闪光》一书写的回忆文章《上路》中，就提及当年他在汇文中学读书时，曾去北大子民图书室借书。那是他“投身革命和文学上路之始”。

在子民图书室的影响带动下，不少大中学学生也建起自己的图书室。如上海大学建的同名的“子民图书室”；北京师院建的“行知图书室”；北大理学院的“五四图书室”；工学院的“六二图书室”；燕京大学的“图书服务部”等。为扶持、帮助汇文中学学生自办的图书室，他们还将重复的书刊送去支援。

至1948年8月，子民图书室藏书已有五千余册，人员、设施与场地也相应扩充。图书室建成一周年之际，又不失时机地开展各种纪念活动：出特刊，办展览，举行纪念会，向校内外广大读者进行宣传，越加扩大了图书室的影响。待进入11月之后，平津战役已经打响，他们根据上级指示，迅即转入护书、护校，迎接解放的斗争。为防止敌特搜查、破坏，隐密地转移了部分书刊。北平解放后，子民图书室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并入北大图书馆。

### (四)

我们认为父亲给巴金先生信中提到的清华同学自办的图书馆，也是在1947—1948年全国解放前夕，为配合各解放战场的节节胜利，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国统区各大中城市学生开展的轰轰烈烈的民主爱国运动中，与北大孑民图书室、北京师院行知图书室等差不多同期筹建的。我们在向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赠书表示感谢的信中，也提到这一点。并询问他们是否还存有父母写给巴金先生的其他信件，以及巴金先生当年向北大、清华学生自办图书馆（室）捐书的相关资料，以便补入专文中。后来收到周立民先生的复信说：“《写给巴金》是我们配合巴金先生的家属整理巴老的文献资料其中一部分，清华先生的书信虽为残简（原件应当是巴老在上世纪80年代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了），但是可见当年他为‘孑民图书室’，为青年学生能够有好书读所付出的心血和一片苦心，所以也很有价值。如果将来，我们整理出来其他曹先生的书信，也一定会及时与您联系。您提到的捐书的相关资料，我们也没有发现，或许当年寄了书也并没有什么记录。”

我们也曾向李广田先生的女儿李岫打听过。李岫是我当年在清华成志学校借读时的同班学友。抗战胜利后，李广田先生随西南联大自昆明复员北上，先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1947年5月因支持学生反国民党暴政，遭到通缉。为形势所逼，接受朱自清先生邀请，转赴清华，朱先生病故后，又接任中文系主任。我们想由于这层关系，李岫对此事或比我有更多了解，不

料她那时却没有留意过。我们由于忙别的事，便将此事搁下了。

去年秋天，应邀去清华参加《清华名师风采》丛书首发式及编著者聚会，趁便去了清华图书馆专门负责搜集、整理有关清华史料与校友捐赠的著作、实物等相关资料的特藏部，在袁欣、王琦频等同志协助下，从清华校史馆网站及《清华校友通讯》丛书刊载的校友回忆录中了解到，父亲致巴金先生信中所提的“清华同学自建的”那个图书馆，果然是在1947年随着学生民主爱国运动迅猛发展，广大进步同学渴望学习革命理论书刊，地下党根据这种情况及时领导、筹划，由学生自治会学艺部出面筹建的。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募集到两千余册进步书刊，包括文学、历史、哲学、社会读物，以及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小册子，于1947年3月8日在化学馆西侧的灰楼正式开馆。为纪念昆明“一二·一”学生民主爱国运动，他们将这个小小的图书馆命名为“一二·一图书室”。开馆后，它也像北大“孑民图书室”一样，受到清华师生与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藏书内容与数量，也不断丰富与增加。许多学生从这里得到革命思想的启蒙和滋养，走上了革命道路。解放后，同样完成了历史使命的“一二·一图书室”，将藏书并入学校图书馆。

清华“一二·一图书室”和北大孑民图书室等在当年席卷国统区各大中城市的民主爱国学生运动热潮中，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的学生在地下党领导下建立的图书馆（室）一样，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它们当年在团结、教育青年中所起的作用是

不可低估的。它们在中国青运史以及图书馆学研究史上，都曾留下了光彩的一页。1985年12月1日，昆明“一二·一”民主爱国运动40周年之际，清华大学团委主持

举行了“一二·一图书室”命名仪式，一代一代新的清华学子们也会继续着他们前辈的路……

2012年2月

## 新发现的闻一多、朱自清、刘文典 给李嘉言的几封信

○李之禹

为纪念清华大学、河南大学百年校庆，整理了李嘉言几篇遗稿及一本遗著。在其遗稿中翻检出闻一多（明信片一封）、刘文典（明信片一封并一笺）、朱自清（明信片一封并三信）给李嘉言的几封信，现予公布，略加说明，以供研究者用，并留存史料。

李嘉言（1911—1967），字泽民，又字慎予，著名古典文学研究家，河南武陟人。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1935年回清华任助教，抗战后在长沙临时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2年后在兰州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任教授。解放后一直担任河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中文系主任。

大学求学时选修刘文典“选学”、“辞赋”课，完成《从王粲〈登楼赋〉说到辞赋与骚赋之区别》、《〈昭明文选〉流传之原因》（见《清华周刊》）；选修闻一多“楚辞”、“唐诗”课，发表《为“长吉生平的考证”质王礼锡君》、《楚辞溯源》、《诗经作者镌略》（均见《清华周刊》）、《韩氏系年订误》（见《文

学季刊》）；1934年2月至5月选修朱自清“李贺”课，完成《昌谷诗笺》三万余字，朱自清批注甚多，后发表了《昌谷诗校释》（见中华书局《语言与文学》）。闻、刘、朱三位先生是李嘉言的恩师并共事七年。从李嘉言以后发表的论著及信件、交往中，李嘉言对其恩师尊崇有加，常执弟子礼。从下列信中知，闻先生1939年到1940年匡审了李嘉言《贾岛年谱》定稿，从现存《贾岛年谱》定稿手抄本中，可见闻先生精心批注修改甚多。《贾岛年谱》初发表于《清华学报》十三卷二期，文后作者特别“附识”：“此文承闻先生一多謔正多处，谨此致谢”，句间称谓，足见其敬。《贾岛年谱》获1944年教育部全国学术创作二等奖。五月一日朱自清先生自昆明给在兰州任教的李嘉言去信，予以祝贺（见信三）。足见当年老一辈学者笃于情谊，在抗战艰苦年月相处之融洽。从信件中又可看到师生、同事间学术讨论之恳至无私。当年的学术精神，学者风范，可见一斑，令人敬仰。